

西非的苏非主义： 历史、现状与新苏非教团

李维建

本文讨论了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在西非的历史与现状，社会功能与最新发展趋势。首先探讨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在西非的发展过程，认为以这两个苏非教团为代表的苏非主义主导了近代以来西非的伊斯兰教；其次，苏非主义与西非的政治关系密切，西非现代政治背后也有明显的苏非主义因素；第三，20 世纪中期以来，西非苏非主义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宗教政治环境，瓦哈比主义的到来与世俗民族主义思潮对其构成一定的挑战，但是新苏非主义的发展趋向继续成为破解困局的手段。

关键词：伊斯兰教 苏非主义 新苏非教团 西非 政治

作者李维建，1972 年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它由最初简单的禁欲主义，经过苏非导师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演变成后来的神秘主义。苏非神秘主义的组织形式为苏非教团，这种以导师为中心的、由众多苏非弟子组成的宗教组织逐渐衍生出宗教组织之外的社会功能，使它们的影响不只局限于伊斯兰教之内。

西部非洲是伊斯兰世界中受苏非主义影响最为巨大的地区之一。西方学者自 19 世纪开始了对西非苏非主义的研究。亨瑞奇·伯斯（Heinrich Barth, 1821-65）、欧仁·马热（Eugène Mage）、崔明翰（J. Spencer Trimingham）、摩温·黑斯克特（Mervyn Hiskett, 1920-1994）、尼赫米亚·列文森（Nehemia Levtzion, 1935—2003）等人相继出版了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崔明翰的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苏非主义在西非的传播

早在公元 10-11 世纪苏非主义已经到达西非地区。苏非主义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传播到西部非洲，一是由西非之外的人把苏非主义带进来，北非的苏非主义南传到西非就属此种情况。由于地缘关系，北部地区的柏柏尔人成为向西非传播苏非主义的主力，另外，从阿拉伯或西班牙远道游学的苏非也为这一地区带来了苏非主义。近代的法国殖民者把非洲的苏非苦修士称做马拉布特（Marabout）。二是由西非居民主动地把苏非主义

带进来。西非的穆斯林在向麦加朝觐途中或在麦加逗留期间，经常接触到苏非主义，并加入某个苏非教团，回到家乡后开始扩大苏非主义的影响。

苏非主义最初在西非传播的时候并不像后来那样有教团形式的组织，起初只是一些单独的苏非在活动，苏非主义的特色并不明显。与其他伊斯兰长老不同的是，苏非长老有比较强的清教主义倾向，他们通常拥有一个小小的修道堂。11 世纪时毛里塔尼亚的穆拉比特运动（al-Murābitūn Movement）就是由一位名叫阿布杜拉·伊本·亚辛（'Abd Allāh ibn Yāsīn）的伊斯兰教长老发起的。他领导的运动是在改革伊斯兰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他的运动是向“不礼拜，不念真主之名”的穆斯林展开的，要求人们回归伊斯兰正道。伊本·亚辛修道堂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大量的弟子，由众弟子组成的军队，焕发出巨大的宗教、军事和政治力量。他消灭了当时西非的加纳王国，建立了伊斯兰教的穆拉比特王朝，进一步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①穆拉比特运动促进了摩尔人的伊斯兰化，此后，摩尔人的苏非传教师源源不断地走向西苏丹^②，继续传播伊斯兰教和苏非主义。

13 世纪，在撒哈拉沙漠南缘和萨赫勒地区已经有大量的苏非长老建立了自己的修道堂，修道堂周围是长老弟子的住所。从毛里塔尼亚过来的苏非把苏非主义的宗教实践传播到塞内加尔河以南的很多地方。14 世纪，这里的柏柏尔人组成了类似于苏非教团的组织，苏非长老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到他们面前祈福降魔。15 世纪的时候，卡迪里教团和沙兹里教团已经在这里出现。

但是早期苏非主义在西非黑人地区的传播非常缓慢，阻力很大，这个阻力主要来自当地居民的宗教文化传统。他们根据传统宗教任意更改伊斯兰教法律，例如他们规定在星期四举行聚礼而不是在星期五，禁止穆斯林吃鱼、蛋等食品。早期的苏非主义传播正是在反对这些错误做法，恢复伊斯兰教本来面目的背景下进行的，没有太强烈的苏非主义特点。再加上当地文化传统的强烈反弹，早期苏非主义在西非并没有留下多少明显的痕迹。如果说有的话，那也主要是对西非某种程度上的伊斯兰化，而不是苏非主义化。“教团在黑人中并没有取得像摩尔人中那样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作用……”，^③以至于一些地区的黑人接受苏非主义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事实上，在 19 世纪之前，苏非教团并不是西部非洲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元素。^④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的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说中世纪之前的西部非洲并没有苏非主义，苏非主义在这里的传播与发展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18、19 世纪是苏非主义在西非的大发展时期。苏非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和伊斯兰教

^① 有一些学者最新的研究表明，伊本·亚辛并没有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消灭了加纳王国，而是与之签订了和平条约。

^② 苏丹一词来自阿拉伯语 *bilād as-sūdān* 意为“黑人的土地”，这个词是用于东非和西非的一个地理文化概念。它所指的范围北起萨赫勒地区，南至热带丛林地区，西起大西洋沿岸，东至现在的苏丹共和国。此地区适合农耕。苏丹地区分为东苏丹、中苏丹和西苏丹。

^③ J. Spincer Trimingham: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58.

^④ 同上。

圣战运动把“苏非主义从城镇推进到乡村，从精英阶层推进到普通民众”。^①这期间，每个人都要与某个苏非教团相联系，这成为一个穆斯林的象征，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某个教团的成员，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穆斯林。由此可见苏非主义在西非的地位和影响。目前绝大多数西非穆斯林都属于某一个苏非教团。

西非历史上和现在影响比较大的苏非教团是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西非的沙兹里教团成员非常少，只在几内亚西部有少量分布，有一部分成员转向提加尼教团，可以忽略不计。西非还有一个名为阿鲁西（'Arūsiyyah）的小教团，主要分布在乍得地区，其成员后来也转向了提加尼教团。所以现在西非只有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发挥着作用。由于苏非主义对西非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影响是近代的事情，这倒为我们叙述西非苏非主义的历史提供了方便。我们只要把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在西非的情况说清楚，也就基本上了解了西非苏非主义的状况。

（一）西非的卡迪里教团

卡迪里教团是第一个传入西部非洲的苏非教团。西非的卡迪里各分支教团都把他们的道统追溯到撒哈拉沙漠中以昆塔部落（Kunta）为中心的穆赫塔尔教团（Mukhatariyya），该教团由萨迪·穆赫塔尔·昆提（Sidi al-Mukhtar al-Kunti，1729-1811）建立。^②关于西非早期卡迪里苏非主义的传入，有一种说法是昆塔部落的乌玛尔·谢赫（'Umar al-Shaykh，1460-1553）到麦加朝圣时加入卡迪里教团并把它引入西非，即西非卡迪里教团直接来自麦加，没有经过撒哈拉的穆赫塔尔教团。^③乌玛尔在廷巴克图以北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修道堂，他的弟子们正是从这里把教团传播到尼日尔河湾、豪萨等地区。卡迪里教团在西非发展成具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的苏非教团，却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

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ān Dan Fodio）是卡迪里教团的杰出人物，1804年起，他领导了西非历史上最著名的伊斯兰圣战和改革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卡迪里教团的影响超出了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达到尼日尔河中游和塞内冈比亚地区。宗教权力开始介入世俗权力，卡迪里教团的长老在塞内冈比亚的富塔贾隆（Fouta Jallon，1725）、富塔塔罗（Fouta Toro，1776）、尼日尔河中游的玛西纳（Masina，1810）和尼日利亚西北部的索克托（Sokoto，1804）等地建立了伊斯兰神权国家。

乌玛尔在廷巴克图的修道堂培育出了一大批弟子，比较出名的有西迪亚·凯贝尔（Sidya al-Kabīr，1780-1868）和西迪亚·巴巴（Sidya Bābā，1869-1924），二人执掌教团权力期间，卡迪里教团的力量扩大到毛里塔尼亚的摩尔人和塞内加尔的沃洛夫人（Wolofs）中间。这一时期，西非的卡迪里教团也出现了一些分支教团，主要有：西迪

^① Nebemia Levtzion & Randall L. Pouwels, eds.: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31.

^② 同上, pp.443-449.

^③ Seyyed Hossein Nasr, ed. *Islamic Spirituality: Manifestations*,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295. 不过这种说法与“西非的卡迪里各分支教团都把他们的道统追溯到撒哈拉沙漠中以昆塔部落为中心的穆赫塔尔教团（Mukhatariyya）”观点相矛盾。

亚·巴巴创立的利西迪教团 (Lisīdiyyah)、穆罕默德·费德尔 (Muḥammad Fādīl, 1860 年卒^①、一说大约 1795–1868 年^②) 创立的费德尔教团、阿赫默杜·班巴 (Ahmadou Bāmbā, 1927 年卒) 创立的穆里德教团 (Murīdiyyah)。这些分支教团因地因人而异, 适时调整自身, 适应西非黑人的精神需要。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当数穆里德教团, 它的成员众多, 特别是在以农业为主的沃洛夫人和塞内加尔的“异教徒”中间传播最快。所以这个分支教团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农业生产, 鼓励集体农耕。教团大约成立于 1905 年, 创立者阿赫默杜·班巴是一位沃洛夫人传教师。由于穆里德教团发展太快, 引起法国殖民者的高度关注, 班巴相继被流放到加蓬和毛里塔尼亚。这不但不能阻止教团的继续发展, 反而让教团扩张得更快。班巴去世后, 经过教团内部的斗争, 他的儿子穆斯塔法·麦巴克埃 (Mustafa Mbacké) 取得教团领导权。1945 年穆斯塔法去世, 教团内部围绕继承权又起纷争, 不过教团至今仍然保持统一的状态, 仍是塞内加尔最重要的苏非教团。费德尔教团的创立者穆罕默德·费德尔把教团中心建立在毛里塔尼亚的西部, 但是它在西非的影响主要是在塞内加尔。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为止, 卡迪里教团在西非的影响已经明显减弱, 教团成员大量转向提加尼教团。

(二) 西非的提加尼教团

提加尼教团是一个近代苏非教团, 教团的建立者阿赫默德·提加尼 (Ahmad al-Tijani, 1737–1815)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南部地区。教团的中心在马格里布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国家, 西非只是其边缘地区, 不过由于这个教团迅速发展, 它成为西部非洲最大和最有影响的苏非教团之一, 并且仍在快速的发展当中。

提加尼教团与以往的苏非教团有些不同的地方, 一是这个教团认为阿赫默德·提加尼本人直接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相联系, 中间没有其他长老作为道统传系; 二是阿赫默德·提加尼自称“封印的圣人”, 即他之后没有比他等级更高的圣人, 以确定他至高的圣人地位; 三是他反对神秘的苦修等苏非主义的宗教实践, 认为日常生活就是走向真主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新苏非主义教团的特点; 四, 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 五, 提加尼教团与西非的卡迪里教团相比, 不太注重教团成员的形而上的宗教知识, 认为行动的作用大于知识。正是因为提加尼教团把行动放在知识的前面, 这种观点为那些没有知识的平民带来了拯救的希望, 许多平民纷纷加入这个教团, 所以提加尼教团迅速发展起来。

大约在 1789 年左右, 穆罕默德·哈非兹 (Muhammad al-hāfiz) 把提加尼教团引入毛里塔尼亚南部地区, 这是提加尼教团最早进入西非。当时毛里塔尼亚南部穆斯林全部是卡迪里教团的成员, 等到穆罕默德·哈非兹去世时, 他的部落已经全部加入提加尼教

^① Seyyed Hossein Nasr, ed. *Islamic Spirituality : Manifestations*,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295.

^② Nebemia Levtzion & Randall L. Pouwels, eds: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45.

团, 这为教团在西非的扩张打下了基础。

19 世纪是提加尼教团在西非发展最快的时期, 主要是在哈吉·乌玛尔·塔勒 (al-Hajj Umar Tall) 的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也成为提加尼教团历史上的转折点。哈吉·乌玛尔·塔勒 1797 年生于富塔塔罗, 到麦加朝圣时加入提加尼教团。他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教团实现了大发展, 一, 吸引西苏丹地区有文化的人士加入教团, 为此他造访了博尔努、索克图、富塔贾隆、玛西纳等穆斯林居住的中心。他的这一策略证明是成功的, 这些新成员不但为教团赢得了更多的新生力量, 还成为为教团进行理论辩护的有力武器。二, 一些穆斯林阅读他的著作之后, 被他所阐述的提加尼教团的理论所折服, 遂加入该教团。三, 哈吉·乌玛尔发动的圣战, 获得了强大的宗教和世俗权力, 一些人或仰慕他的权力, 或迫于他的权力, 遂加入提加尼教团。1830 年左右, 哈吉·乌玛尔·塔勒被任命为提加尼教团在西苏丹的总代理。哈吉·乌玛尔·塔勒不满西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异化, 遂发动大规模圣战, 在塞内加尔东部和马里地区建立了政权, 提加尼教团实际上在西非建立了与社会生活和政权结构紧密联系的新生的伊斯兰国家。^①不久, 新生的政权被法国殖民者摧毁, 但这并未能阻止提加尼教团在西非的飞速扩张。在塞内加尔的沃洛夫人地区, 马立克·萨伊 (Malick Sy) 让提加尼教团站稳了脚跟, 提瓦欧尼 (Tivaouane) 成为教团的一个中心。阿柏杜勒·尼阿斯 (Abdoulaye Niass) 在塞内加尔的萨阿鲁姆 (Saalum) 地区扩大提加尼教团的力量。哈玛拉赫 (Hamallah) 以马里为中心建立了提加尼教团的另一个分支教团, 这个教团在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的影响也很大。

哈吉·乌玛尔·塔勒的努力使提加尼教团对西非苏非教团以后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他去世后, 提加尼教团所具有的苏非主义的精神和特色逐渐模糊起来, 教团的对外圣战和内部争斗使苏非精神持续恶化。法国殖民者的到来更加剧了这一局势。教团领导人的命运也发生重大转折。有的为躲避殖民统治, 逃亡国外; 有的被迫留下来却无所适从; 有的则与殖民政府合作; 有的干脆专心宗教修炼, 不问政治。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挡提加尼快速发展的脚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西非的提加尼教团仍然处在飞速的扩张中, 人们蜂拥而至加入其中。但是教团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没有被教团成员广泛接受的精神领导人。从此教团陷入了分裂。不过与哈吉·乌玛尔·塔勒有亲缘关系或道统联系的提加尼苏非长老仍在西非的提加尼教团中占主导地位。

二、苏非教团与西非政治

西非的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与政治的联系非常紧密, 尤其是提加尼教团一直有鼓励教团成员参与政治的传统。

两个教团与政治联系最重要的表现是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 进入 18 世纪以来, 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卡迪里教团的著名长老萨迪·穆赫塔尔·昆提是圣战运动的积极发动

^① Louis Brenner, *West African Suf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42.

者。如前所述，19 世纪初，卡迪里教团的奥斯曼·丹·福迪奥发动了伊斯兰圣战运动，在他们的领导下，西非的戈比尔（Gobir）、赞法拉（Zamfara）、卡齐纳（Katsina）、凯比（Kebbi）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灭掉了当地的一些地方小王国，到 1812 年终于建立了富拉尼人的大帝国。帝国由奥斯曼·丹·福迪奥的兄弟和儿子掌管具体事务，他本人则作为哈里发掌控大局。卡迪里教团政治性的圣战运动并没有到此为止，奥斯曼·丹·福迪奥的弟子阿赫默德·洛博继续在玛西纳（Masina）地区发动革新运动。1850 年，卡迪里教团的另一长老哈吉·玛赫穆德（al-Hajj Mahmud）也领导了一场圣战运动，在他征服的每一个城镇都建立了清真寺。在毛里塔尼亚，卡迪里教团长老西迪雅赫·卡贝尔（Sidiyah al-Kabir，死于 1868 年）既是苏非导师，也是政治家。他建立修道院有时候不只是宗教上的考虑，还有政治用途方面的考虑。他的弟子阿赫默德·班巴也是西非著名的政治人物，他建立了卡迪里教团的穆里德分支教团，该教团在塞内加尔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殖民统治期间，苏非教团的另一功能是作为法国当局和当地居民的调解人，为了稳定统治秩序，殖民者有时不得不给苏非教团以有限的支持。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团都那么幸运，阿赫默德·班巴就没有得到殖民当局的信任，被流放到外地。这也从反面说明苏非教团的活动可能会危及殖民统治秩序，法国人只有对苏非教团的政治力量进行打压。^①

提加尼教团的活动也不能让法国殖民者放心，有些地方每当提加尼教团举行宗教活动时，殖民当局就派人到场监督。20 世纪上半期，提加尼教团的一位著名长老哈玛拉赫（Hamallah）的一举一动更是让他们惴惴不安。哈玛拉赫并不是一位想参与政治的苏非长老，他对周围混乱的社会、政治生活不闻不问，所关心的只是纯宗教的事情，专心修道。法国殖民者一直想利用哈玛拉赫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威信和号召力，利用他巨大的社会力量动员的能力为殖民统治服务。哈玛拉赫坚辞不受，拒绝与殖民政府合作。不合作态度为他招来横祸。殖民者认为他作为苏非长老，不能处理好教团内部的纷争，没能缓和苏非信徒反政府的活动，也没有按照要求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法国留学，遂宣布将他流放 10 年。^②

西非的苏非教团是西非政治生活中绝对不能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殖民者已经认识并领教了它的巨大政治力量。在如今西非许多国家已实行政党政治的环境下，苏非教团的政治力量同样不可小觑。苏非教团与政党政治结合成为西非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很多政党都有或多或少的苏非主义背景。

三、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西非苏非主义的新发展

^① John L. Esposito,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Islamic World*, Volume 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30-131.

^② Louis Brenner, *West African Suf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45-55.

20 世纪中叶以来,西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苏非主义也同样在这种变迁中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20 世纪 50 年代,西非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了反苏非主义的倾向。反苏非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多为开罗艾兹哈尔大学的毕业生,通常称他们为瓦哈比或萨伯努(Subbanu)。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已经被西非本地的宗教文化传统污染了,必须改革以回归阿拉伯传统;他们反对圣人崇拜和苏非主义的修道训练;萨伯努主张一夫一妻制,一位著名的萨伯努教师认为“《古兰经》强烈反对多妻制,只是没有直接说明而已”^① 萨伯努运动与苏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冲突,有时候是剧烈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在西非的穆斯林中占绝对优势,萨伯努毕竟是少数,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没有威胁到苏非主义在西非的主导地位。

以前,西非的苏非通常要到毛里塔尼亚和马格里布去接受更高层次的神秘主义教育,以获得宗教知识和更高品级。20 世纪 50 年代,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的苏非不再把毛里塔尼亚和马格里布地区看作苏非主义修炼过程中必须到访的地方,那里已不再是他们的向往之地。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撒哈拉沙漠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埃及和中东的宗教圣地成为他们朝圣的新目标。西非地区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联系更加紧密。

20 世纪 50-60 年代,西非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的国家除极个别的外,基本上执行一条把伊斯兰教和苏非主义边缘化的政策。当权的政治家认为宗教是一种注重派别斗争的思想体系,政治上难以控制,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利,应该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苏非主义首当其冲。例如,刚刚独立的几内亚,反圣徒崇拜,反苏非苦修士(marabout)的政治气氛很浓。除了执政的几内亚民主党之外,其他任何组织的公开集会都受到限制,宗教集会更不能例外,穆斯林举行传统的宗教集会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密监控。政府认为苏非苦修僧是江湖骗子,传播疯狂的思想,破坏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强行推倒圣墓等苏非的活动场所。只有塞内加尔对苏非主义的政策比较宽容,这是因为政治家的利益倚重于苏非教团,离不开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等的支持。但个别不能代表整体,西非的苏非主义受到严重打击,活动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西非国家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国际环境。阿拉伯国家取得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非洲统一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伊斯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有了自己的声音。以沙特和科威特等国为首的石油富国成立了一些伊斯兰国际银行,对伊斯兰国家实行金融援助。西非国家的政府逐渐认识到站到伊斯兰一边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西非各国内穆斯林的身份意识也在潜滋暗长,对政府实行的宗教政策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同时随着一些国家的政治从个人独裁向政党政治的转变,如何想方设法获得穆斯林的选票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在诱惑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非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这直接优化了苏非主义在西非的生存环境。仍以几内亚为例,政府成立了伊斯兰委员会和伊斯兰事务部,管理全国伊斯兰教

^① Nebemia Levzion & Randall L. Pouwels edited: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90.

事务。政府出资建设清真寺，把伊玛目列为政府公务员，享受政府的津贴。苏非教团受到了国家伊斯兰委员会的支持，苏非苦修士也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西非的其它国家，苏非教团的生存环境也大为改善，在塞内加尔，由于苏非教团的选票决定选举的结果，执政者便在政府部门中安排苏非教团的长老，与苏非教团达成一些认识上的共识，以促进穆斯林的内部团结。执政者这样做一方面是想争取苏非的选票，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认识到，苏非主义作为国民的大众信仰，已经成为政治家不能忽视的存在。对苏非主义不能一味打压，只有进行适当的引导才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非的苏非主义面对现代化的进展，从思想到修道实践方面都进行了一些调整，总的方向是适应现代化的大环境，思想上也更加调和适中。这与西非伊斯兰教的总体向调和与宽容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西非伊斯兰教中原有一些激进主义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激进主义逐渐失去了暴力与派别斗争的含义，更强调伊斯兰教的原始含义，即遵守第一代穆斯林的宗教实践。穆斯林所讲的斗争是指自己内心的斗争和穆斯林社区内部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尽量遵守伊斯兰教最初信仰，而不是彼此打击对方。^① 这一时期的西非穆斯林注重相互之间的宽容，苏非教团，萨伯努、激进主义之间尽量不要互相指责。有的苏非长老命令弟子进行修道时，也要遵守正统教法，按时礼拜，遵法派苏非主义倾向日趋明显。

四、西非苏非主义的特点：新苏非教团

传统的苏非主义强调禁欲、苦行、脱离俗世事务，以达到与真主合一的最高境界。而近代以来西非苏非主义，虽然领导者多为苏非长老，我们发现他们却积极入世，领导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夺取世俗政权，并不注重传统苏非主义的宗教实践，显示出他们与传统苏非主义的不同。对此，有学者提出新苏非主义的概念加以解释。

巴基斯坦学者法兹勒·拉赫曼（Fazlur Lahman）给新苏非主义的定义是：“按照正统派改革的和作为一种运动意义上解释的苏非主义”^②。新苏非主义一改传统苏非主义与真主合一的修道目标，重新提出与先知穆罕默德精神或人格合一的目标。这种改变的意义在于新苏非主义不再重视传统的修道理论、方法和目标，而主要转向伊斯兰正统信仰，苏非也应传授正统的教义信仰与教法规定。随着苏非理论层次上的改变，新苏非主义在实践上也转变为在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时，大规模地从事近代伊斯兰圣战运动，从而使新苏非主义具有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这就是“作为一种运动意义上解释的苏非主义”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苏非主义的复兴，或者说新苏非主义教团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统苏非教团向新苏非教团转变，即改革型的苏非主义，

^① Nebemia Levtzion & Randall L. Pouwels, eds.,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02.

^② 转引自周燮藩：《新苏非主义和新苏非教团》，《伊斯兰教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 93 页。另见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47 页。

另一种是另立新苏非主义教团。这两种复兴方式在西非都存在,前者体现为卡迪里教团,后者则体现在提加尼教团身上。

卡迪里教团是一个最为古老的苏非教团,几乎所有的苏非教团都可以追溯到卡迪里教团身上,但是这个最为传统的教团,到18世纪也在向新苏非主义转变。就西非的卡迪里教团而言,主要体现为奥斯曼·丹·福迪奥领导的豪萨圣战运动、玛西纳的阿赫马杜·洛博领导的圣战运动和博尔努的加涅米领导的圣战运动。奥斯曼·丹·福迪奥最早从柏柏尔人昆塔部落的苏非长老穆罕默德·马吉里(Muhammad al-Maghili)的著作中接受了卡迪里苏非主义,而昆塔部落的卡迪里苏非主义受埃及新苏非主义的影响。奥斯曼·丹·福迪奥在豪萨推行具有温和色彩和改革倾向的苏非主义,把矛头指向混合伊斯兰主义,希望通过圣战运动达到纯化豪萨伊斯兰教的目标。奥斯曼·丹·福迪奥之后,阿赫马杜·洛博和加涅米也在西非领导了卡迪里苏非主义运动。

提加尼教团则是新生的新苏非主义教团,由艾哈迈德·提加尼于18世纪末创立于北非的非斯。提加尼称直接承启真主的教导和福佑,否认本教团之外其它所有的圣徒崇拜。提加尼教团内聚力强,组织严密,鼓励教徒以实际行动(通常为圣战)推进伊斯兰教传播。西苏丹的曼丁哥人各部族承袭了提加尼教团的思想,哈吉·乌玛尔和萨摩里等人于19世纪发动了圣战运动。

虽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瓦哈比主义在西非也有一定的传播,但总体而言,卡迪里和提加尼教团仍居主导地位,这两个教团几乎就相当于西非的伊斯兰教,因此,作为这两个教团主导思想的新苏非主义成为西非伊斯兰教的最大特点。

五、小 结

由此可以看出,苏非主义在西非的传播过程是漫长的,几乎与西非伊斯兰教的历史相当。但是苏非主义真正在西非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苏非主义在自从18-19世纪西非伊斯兰运动以来,苏非主义开始在西非伊斯兰教中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非,苏非主义几乎等同于伊斯兰教,这一格局至今未变。但西非苏非主义内部的格局却一直在不断变化。由19世纪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的并驾齐驱,发展为20世纪提加尼教团的后来居上,同时苏非主义也面临着来自以瓦哈比主义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的冲击。文化上,在西非苏非主义与本土的非洲文化调和的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特色,即新苏非主义的发展路径;政治上,20世纪的西非苏非主义已从19世纪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上滑落下来。但是它却在现代政治的环境下以新的方式生存下来,并对西非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 李建欣)